

中国“开言路”概念的历史语义学考察

——兼论“开言路”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郭毅

摘要：“开言路”是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政治言论开放形式。清末，“开言路”观念与西方办报思想合流，近代出版技术和以新闻纸为代表的“新媒介”为知识分子论政提供了新的介入方式，“开言路”的范畴得以扩大。尽管“开言路”与“言论自由”观念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前者为“言论自由”观念的输入提供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开言路；言论自由；概念史；历史语义学

作者简介：郭毅，男，硕士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北京，100875）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5-0050-05

一、问题的提出

史学家邹振环曾在《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一书的开篇提出这样的追问：“在中国传播的西学究竟有无自身的统宗——学术脉络呢？”^[1]受“崇古、宗经、征圣”的儒家传统思想价值取向影响，^[2]不少西学观念在输入中国时，曾被比附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意象。民权平等思想与公羊三世说相比附^[3]，西方办报观念则与古代“采诗”传统相比附^[4]。康有为甚至认为“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5]近代著名翻译家贺麟在评价严复的翻译时也透露，“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6]徐保禄（徐光启）曾跟随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并在一年后用中国文字完整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对此，利玛窦认为“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7]那么在“言论自由”概念舶来之前，中国本土是否也有一个传统观念能够与之对应？

马光仁先生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和民国报人翁大草的《读贞观政要论广开言路与言论自由》都将中国古代的“开言路”观念与“言论自由”观念相比附。^①这为我们思考“言论自由”的统宗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开言路”究竟是不是“言论自由”观念的中国传统表达？“开言路”与“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开言路”概念进行一番历史语义学的考察。^②

二、“开言路”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观念

“言路”一词在我国典籍文献中十分常见。以二十四史为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李广利传》、《汉书·王莽传》、《后汉书·袁绍传》、《三国志·袁绍传》、《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

① 马光仁.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30-31. 翁大草. 读贞观政要论广开言路与言论自由 [J]. 载《宪政月刊》, 1944 (10): 18-25.

② 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开始采用概念史（或称“历史语义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这种方法将概念视为变数，认为概念的含义在历史语境中随社会政治因素变动。因此，这种方法在考察近代知识的形成以及相近概念的关系方面十分有效。可参见：郭毅，概念史：“出版自由”的新闻史研究新路径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 (6): 37-40.

六》、《旧唐书·萧至忠传》、《新唐书·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新唐书·外戚传·杨过中传》等都使用过“言路”一词。唐宋诗句中也有不少关于“言路”的句子。晁说之的《旅怀》中说，“立朝不得当言路，在野无从自行田”。他的《我生》中又说，“一道德来千道会，试开言路问群贤”。陆游的《新夏感事》中说，“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开言路”在古代文献中被表述为一种开明的执政策略。以二十四史为例，《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中》记载，后唐末帝李从珂曾召见学士马裔孙，说“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8](645)}《宋史·司马光传》中也记载，“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9](10767)}《元史·刘正传》记载，仁宗即位时所施八项国政中，即有“开言路”。^{[10](4108)}《元史·张桢传》中有视轻大臣、解权纲、事安逸、杜言路、离人心、滥刑狱，为“根本之祸六”的说法。^{[10](4266)}《明史·李贤列传》有“贤务持大体，尤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11](4676)}的说法。

“开言路”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六》记载，“两汉以来，日蚀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盖欲周知时病，尽达物情，用缉国章，以奉天诫。朕每思逆耳，罔忌触鳞，将洽政经，庶开言路。况兹谪见，当有咎征。其在列辟群臣，危言正谏，极万邦之厉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极。”^{[8](93)}历代官员也纷纷就“开言路”的好处上疏：“广言路然后知得失，达民情然后知利病”^{[9](10914)}，“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9](11934)}，“开言路以广忠益”^{[9](12170)}，如此云云。总之“开言路”的直接后果是天下殷昌、永建皇极。所以史书上才有“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11](5017)}的说法。

那么如何做才能“开言路”呢？根本之策就是“增谏官”。清季以前历朝历代的朝臣上疏中，无不以此为“开言路”的不二法门。^①《明史·骆问礼列传》中说得更详细一些，“顷诏书两下，皆许诸人直言。然所采纳者，除言官与一二大臣外，尽付所司而已。宜益广言路，凡臣民章奏，不唯其人唯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11](5682)}总之，“开言路”即是向皇帝进谏，且进谏免罚。

三、清末“开言路”观念与办报思想合流

清代道咸以降，民族危机空前，封建君主不得不再次取法传统的“开言路”，清流党登上历史舞台。《清史稿》中说，“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12]这些“好言事者”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以“士”自居，在民族危机加深之际，针对民生、吏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建言献策、指斥时弊。

另一方面近代出版技术逐步发展，西方办报思想传入中国。早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曾介绍美国“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13]。1846年的《海国四说》介绍新闻纸“所载皆船货来往期日、市价及买卖田庐、租税房舍之值，并官员、士子、兵丁所言、所作事，广及海外一切闻见。”^[14]传教士花之安的《自西徂东》中说：“下民受屈有不能自鸣者，新报馆可代为之鸣矣”，“人君端居九重，恒患下情之不能上达，封疆大吏，亦患民情之不能周知，今中国诚能广设新报于民间，则民瘼上通，君恩下逮”^[15]。被梁启超视为“论政治最通之书”的《佐治刍言》中介绍英国“准民间公议，登诸新闻纸上，以备采择。”^[16]被王韬视为“西史佳本”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报馆“所延主笔更可得绝伦超群之名士，其所持论皆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一遇重大之事，诸名流逐日主持清议，阅报之人亦复互相议论。”^[17]《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自主之理》、《经书》两篇中，也有“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

① 《宋史·石扬休传》中说“请增谏官以广言路”；《宋史·孙洙传》中说“乞增谏员以广言路”；《宋史·吕公著传》中说“乞备置谏员，以开言路”。

政法度，可以议论慷慨”^{[18] (340)}，以及“智慧聪明之帝君开言路，各著其志，所以学问兴隆焉”^{[18] (204)}的介绍。《初使泰西记》记载了光绪年间作者初到美国的见闻，“新闻纸为舆论所关，善会堂乃清议所在”^[19]。1898年12月20日的《译书公会报》甚至翻译德国报纸，明确交代了如何通过报纸大开言路：“各报馆主笔旁征博引，立论宏通。凡国中有关政治之事，无不登报。且每日将报送至政府。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政府皆采择施行，并且竭力帮助使归实际。”^[20]

透过这些西方经验，当时的中国士人开始看到通过报纸（新闻纸）议论国事的可能。而这些西方经验也促使他们努力反思自我，寻求自身文化传统与西方办报思想的对接点。于是他们发现，“我中国邸报开设千年，本远出于西报之前”，中国古代采诗传统似乎皆能与西方办报思想一一对应。他们看到“诗者，即今之新报”，“太师派人采诗如今之采事人也”^[21]，西方新锐思想在中国本土思想场域形成映射，使得他们能够迅速接受西方办报思想并付诸实践。

新潮观念与传统思想一拍即合，“开言路”开始超出传统“增谏官”的办法，转而与西方办报思想合流，中国的知识群体也开始试图通过报纸完成“开言路”（议论国事）的使命。他们深感，“泰西能用吾采诗之法以致富强”，而中国之所以羸弱就是因为“未推而广之采诗之法，又未追而复之，上下内外壅塞耳”。^[21]所以民族危机越发深重之时，通过报纸“开言路”的实践就越发热烈。如《京报》即是在“甲午大创于日，于时上下颇知自危，报界精神，亦由之一振”^[22]的背景下创刊的。再如《申报》记载“某某两侍御日昨会议，以报馆主持清议，为谏院所不能逮，当此预备立宪时代，欲广开言路，尤以维持报纸为救亡之唯一手续。”^[23]

至此，办报被清季知识群体视为一种“开言路”（毋宁说是解救民族危机）的新途径。而其目的也在“上下相通”之外，增加了“开民智”。所以在清末报纸中有关志士办报、政府鼓励读报的新闻报道颇多。1881年2月《花图新报》记载“宁波新创报章，名曰《甬报》，按月一卷，观其议论宏通，措辞精细，询足豁人心目，开人智慧，将来该报畅消，定可预下。”^[24]《北洋官报》1903年5月14日记载“成都傅君樵村所办通俗报出版已数月，近岑云帅以其便于妇孺，特札饬各州县代销，俾可广开风气。”^[25]1903年6月9日记载“扬州志士某君，拟集股开设《淮南日报》并创办《广陵涛》杂志，已有头绪，惟出版尚未定期。”^[26]1903年7月3日又记载“保甲总办许苓太守昨日出示，谆劝商民购阅各报，以益智慧”，而“士为四民之首”更应率先垂范。^[27]连当时权倾朝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开办《湖北官报》时指出，“报馆之设，仿自泰西，采摭新闻，发摭清议，所以宣达下情，启迪民智，开内地之风气，传外国之情形，关系观听，极为重要。”^[28]

1898年光绪帝接受孙家鼐的建议，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上谕中还特别说明：“各报体例，自应以陈利弊，开阔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名目达聪，勤求治理之意。”^[29]但“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毕竟只是理论上讲的，在现实层面，通过报纸“开言路”依然存在一个尺度问题。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开言路”的态度一直以来比较谨慎。康熙在谕旨中所称“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30]即表明清代君主十分担心过度“开言路”导致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清史学者罗冬阳指出“政治表达并非只是遵循‘忠君爱国’的政治伦理原则，里面有着表达者党派的和私人的利益诉求。如果允许充分表达，则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张扬，而且私刑的诉求还会巧妙地编织在‘忠君爱国’的抽象原则里，令人难以分辨，形成一种牵制皇权的力量”，这是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的一个重要原因。^[31]基于这种顾虑，清末君主一面默许（甚至认可）通过报纸广开言路，一面又时而对报纸中的言论进行提防式的审查，对可能危及到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言论不遗余力地封禁。“每期出版须呈督署检阅之后，方准发行”^[25]，“论说须由梁星海太守核定，方准刊行”^[32]，如这般报道十分常见。

官方禁言愈厉，反对禁言的呼声就越大。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言论自由”观念也恰巧从国外“姗姗而来”。人们很快发现它与办报思想（通过办报广开言路）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在当时报刊著述中，“办报自由”常常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交替使用。在报禁和反对报禁的博弈之中，他们向西方言论自由历史回望，寻求西方言论自由实践同国人办报以洞开言路的对接点，依附西方言论自由学说（尽管当时引进的并不全面），论证他们办报以阐发政治异见的合理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言论自由”思想的输入。

四、“开言路”观念并非“言论自由”思想

现在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开言路”究竟与近代西方“言论自由”思想是什么关系呢？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开言路”已经具备了西方“言论自由”思想的某些特征，如可以指陈时弊，就政治得失发表言论。^①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因为这种言论主要是面向皇帝的，它是在帝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规定的路径向帝王“上书”、“进言”，而其自由程度，也完全取决于封建君主的态度。所以传教士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将“大开言路”这个中国传统说法对译为“Freedom of speech to the emperor”。^[33]这个翻译，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开言路”观念与近代西方“言论自由”思想之间相似而不相同的关系。“Freedom of speech”是如今被我们称之为“言论自由”的英文短语，“to the emperor”却强调了对皇帝进谏的中国传统观念。

清末民族危机加深，传统的“开言路”观念逐渐与西方办报思想合流，“开言路”由传统的上条陈谏转为诉诸于自由办报，“开言路”话语实践借以展开的媒介手段，以及实践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开言路”的范畴得到进一步扩大。

但是就本质而言，“开言路”观念与西方自由办报思想合流后，仍然不同于西方原典中的“言论自由”。在西方原典中，“言论自由”是最高价值，“它不是服从某种实际的需要才被认可的”^[34]，而是突出一种个人价值和权利。诚如民国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狭义之人权，文明生活之要素。凡以人为灵者，莫不以之为生人行动所必不可缺。是权既备，而后个人之价值乃益显也，曰思想自由，曰言论自由，曰迁徙自由，莫非民权也。”^[35]而“开言路”则是封建制度下皇权（明君）的恩赐，是缓解民族危机的工具。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开言路”的底线是维持封建秩序，君主集权统治的根蒂不可动摇。在官方话语体系中，鼓吹革命或意图颠覆政府的言论是不被接受的。清末御史温肃就在奏折中将“逆党机关，专意描写政府之腐败，人民之受制。提倡革命，肆敛金钱，以惑军学两界及侨民商界”视为“流弊”。又说“近年过于人心浮动，如饮狂药，诈骗万端，谁实使然？半由报纸之肆惑也。若再务虚而忘实祸，寢成舆论专制，其为患犹不言。”^[36]这恰恰说明在统治者心中，“开言路”只是“务虚”，封建政体和皇权统治才是根本（“实”）。从这个角度上看，“开言路”与“言论自由”的区别实际上体现出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的分野以及各自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正如冯江峰在《清末民初人权思想的肇始与嬗变》中对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区别的归纳：“民本思想表面上要求君主施惠于民，要求君主重视民众的作用，但实际上是为了用民”，“民本思想关注的是对于君主权力的维护，而不是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37]这在本质上决定了“开言路”与“言论自由”的分野。

① 近代西方的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更多的指政治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参见：吴小坤．《自由的轨迹：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0；强调政府与政治压力中的自由，参见：Hun Shik Kim. "Redefining Press Freedom: A Survey of Iraqi Broadcaster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2011 (11): 435.

参考文献:

- [1] 邹振环.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 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
- [2] 任遂虎. 中国文化导论[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4: 241-246.
- [3] 吴雁南.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第一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78.
- [4] 于翠玲.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60-69.
- [5] 康有为. 康有为政论选(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9.
- [6] 贺麟. 严复的翻译[J]. 东方杂志, 1925(21): 78.
- [7] 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517.
- [8] 薛居正. 新校本五代史并附编三种[Z]. 台北: 鼎文书局, 1981.
- [9] 脱脱. 新校本宋史并附编三种[Z]. 台北: 鼎文书局, 1980.
- [10] 宋濂. 新校本元史并附编二种[Z]. 台北: 鼎文书局, 1981.
- [11] 张廷玉. 新校本明史并附编六种[Z]. 台北: 鼎文书局, 1981.
- [12] 赵尔巽. 杨校本清史稿[Z]. 台北: 鼎文书局, 1981: 12460.
- [13] 魏源. 海国图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333.
- [14] 梁廷枏. 海国四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89.
- [15] 花之安. 自西徂东[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179-181.
- [16] 傅兰雅. 佐治刍言[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31.
- [17] 麦肯齐, 李提摩太. 泰西新史揽要[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154-155.
- [18] 爱汉者.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9] 志刚. 初使泰西记(影印本)[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5: 60.
- [20] 译书公会报报馆. 译书公会报(影印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618.
- [21] 开设报馆议[J]. 强学报, 1895(1): 2-3.
- [22] 汪康年. 汪康年文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86.
- [23] 台谏维持清议之计划[N]. 申报, 1909-08-13(4).
- [24] 开设月报[Z]. 花图新报(影印本).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6: 96-97.
- [25] 提倡报务[N]. 北洋官报. 1903-05-14.
- [26] 拟开报馆[N]. 北洋官报. 1903-06-09.
- [27] 示劝阅报[N]. 北洋官报. 1903-07-03.
- [28] 张之洞. 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0: 827.
- [29]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二)[M].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7: 44.
- [30] 彭勃. 中华监察大典(法律卷)[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629.
- [31] 罗冬阳. 明亡教训的清朝解题: 论清前期的言路整饬[J]. 求是学刊, 2012(9): 134.
- [32] 报馆复开[N]. 北洋官报. 1903-06-17.
- [33] 马礼逊. 华英字典(第六卷)[Z].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181.
- [34] 暨爱民. “自由”对“国家”的叙述: 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3.
- [35] 陶履恭. 平等篇[J]. 东方杂志, 1931(8): 10.
- [36] 徐载平, 徐瑞芳. 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263-264.
- [37] 冯江峰. 清末民初人权思想的肇始与嬗变(1840—191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6.